

译以载道：佛典的传译 与佛教的中国化

张志芳 张彬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译以载道：

佛典的传译与佛教的中国化

张志芳

张彬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以载道:佛典的传译与佛教的中国化/张志芳,张彬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615-4503-4

I. ①译… II. ①张…②张… III. ①佛经-翻译-研究-中国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397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福州力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9.75

插页:2 字数:250 千字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佛教开始向印度各地推广,继而走出印度,向世界各地传播:南传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北传小亚细亚地区、中亚的大夏、安息、大月氏,以及西域,并经中亚、西域进入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大地上,从依附会通到碰撞融合,乃至独立发展,与儒道鼎足并行,成为中国文化之有机组成部分,其过程是艰难的,其原因是复杂的。然而,成功的佛典传译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也。”

佛典是佛教教理、教义的载体。佛教所关注的问题是人世间的生死烦恼,其教理、教义是围绕着如何断除烦恼痛苦、明悟心性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的。因而,贯注于经、律、论三藏的基本精神即是——脱离生死轮回系缚,达致湛然寂静的涅槃境地。

佛教这一核心思想与中国固有文化的的精神差异是显著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具有强烈的济世倾向,它以熟通六艺为传统,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价值观,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是一门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

因而,佛典传译要想成功,不能仅仅做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既要传达出佛教的核心精神,又让大多数中国人信受奉行,以此推动佛



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中印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佛典传译大师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成功的关键动因在于“译以载道”的翻译精神：以译化人，使中国信众走上解脱大道。不管是最早来华的译经大师安世高、支娄迦讫“不加藻饰，但求易晓”的译风，随后的格义佛教，抑或是鸠摩罗什大师文采斐然的译笔，玄奘大师“意译直译，圆满调和”的新译，译以载道的翻译精神一以贯之。

从两汉之际的佛典初译至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创立，佛教中国化进程经历了六七百年的时光。在六七百年的漫长岁月中，一代代译经大师们秉承这一精神，以他们的智慧化解了一个个困局。在他们的努力下，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的思想相接触，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终而在中国生根结果，成功融入中国社会，形成了富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

在相关的专著和论文中，有述佛教史的通论者，有关于佛经翻译理论认识的专论，有关于佛教如何在中国扎根的讨论，有关于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之阐述，等等。然而，关于佛典传译如何促使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专著却尚未见到。

本书以佛典汉译历史为脉络，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活动为横断面，论述了中华固有的文化意识如何影响了佛典翻译的文本抉择、翻译策略，以及佛典汉译如何促使佛教入传中国并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体而言，汉魏西晋的佛典初译，让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初具规模。东晋为佛典汉译的转折期，佛教独立发展。南北朝的佛典广译，使佛教在中国广为流布，气象繁荣。迄隋唐，译业鼎盛，佛教也随着开花结果，创宗立派，与儒道鼎足而立。会昌法难后，佛教遭受严重打击，译事中辍。禅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思想宗旨，别开生面，持续发展，俨然成为中国本土自生独有的佛教宗派。有宋一代，官办译场复兴，佛教文教事业空前发展，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



方哲学——朱子学的产生，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儒、道文化在思想理论的深层次上融为一体，深深地根植于华夏大地。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译以载道的翻译精神、译者个人的智慧、翻译能力和文化交际能力，译籍的内容、译典的质量、译籍的种类、数量等等，都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不同态势息息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即是佛教经典的传译过程。

不揣浅陋，求教于方家。



目 录

第一章 佛教在印度的创立与世界传播	1
第一节 佛教的创立	1
一、佛教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1
二、沙门思潮	4
三、佛教的基本教法	6
第二节 佛典的结集和佛教思想的嬗变	10
一、佛典结集和原始佛教.....	10
二、部派佛教.....	11
三、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	12
四、大乘佛教的三个发展阶段.....	13
五、佛教的世界传播.....	16
第二章 佛典初译与中国佛教初具规模	19
第一节 佛教在中国的初步传播	19
一、佛教初传时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19
二、汉传佛教:从依附到信受	22
第二节 佛教初传时的译经概况	25
一、最早的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	26
二、东汉的佛典传布:大小乘并行	28



三、东汉的译经方式和特点·····	41
第三节 三国：初步会通儒道·····	46
一、魏地：译典有所突破·····	46
二、吴地：译业初现，以儒释佛·····	50
三、三教一致论的提出·····	58
第四节 西晋：玄学兴盛与《般若经》传译·····	62
一、竺法护·····	63
二、其他译师·····	65
三、《般若经》空前传译·····	66
第三章 东晋时期佛典传译与佛教的独立发展 ·····	73
第一节 北方地区佛教的兴起与佛典传译·····	74
一、佛图澄与佛教登堂入室·····	74
二、道安与前秦佛典翻译·····	76
三、其他译师·····	85
第二节 鸠摩罗什与后秦佛典翻译·····	88
一、道流西域，名被东川·····	88
二、姚兴护持，广开译事·····	89
三、达意传神，舌不焦烂·····	93
四、开辟译经新纪元·····	94
五、僧叡论翻译之“名实”·····	96
六、其他译师·····	99
第三节 庐山译经·····	102
一、慧远主持庐山译事·····	102
二、慧远的翻译观：文质融合·····	104
第四节 建康译经·····	106
一、佛陀跋陀罗·····	106



二、法显与律学的兴盛	107
三、宝云、智严、智猛	111
第五节 译业发达与玄佛合流	113
一、格义佛教的展开	114
二、般若学六家七宗	117
三、格义困境的突破	123
第六节 译经领袖会通儒佛文化	128
一、道安与佛教文化本土化	129
二、慧远与沙门不敬王者	132
第四章 南北朝时期佛典广译与佛教广弘	139
第一节 南朝佛典翻译	141
一、求那跋陀罗与宋、齐译经	141
二、真谛与梁、陈译经	145
第二节 北朝佛典翻译	151
一、昙无讖与北凉译经	151
二、菩提流支：北朝译经巨匠	156
三、其他译师	160
第三节 《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	163
一、僧祐与《出三藏记集》	164
二、慧皎与《高僧传》	170
第四节 佛典多元译传与佛教学派涌现	176
一、佛典多元译传与广泛佛学交流	176
二、竺道生的佛性论与涅槃学派	180
三、其他学派	187
第五节 译业繁荣与儒佛思想的碰撞交融	190
一、南朝佛教与儒道的争锋交融	193



二、北朝三教争斗与灭佛事件	211
第五章 隋唐时期译业鼎盛与三教鼎立	220
第一节 隋代佛典翻译	221
一、“开皇三大师”与译业复兴	223
二、彦琮及其《辩正论》	227
三、费长房与《历代三宝记》	233
第二节 初唐佛典译传	237
一、波罗颇迦罗蜜多罗	238
二、玄奘与唯识宗的创立	239
三、翻译史的新高峰	248
第三节 武则天时期的新译	254
一、菩提流志与《大宝积经》编译	255
二、实叉难陀与“八十华严”	256
三、义净与律藏翻译	257
四、其他译师	260
第四节 中晚唐佛典翻译	261
一、般刺密帝与《楞严经》	262
二、“开元三大士”与密宗	263
三、般若三藏：唐代最后一位名译师	267
第五节 佛教创宗与三教鼎立	268
一、隋代的创宗	269
二、唐代的创宗	271
第六章 译事式微与佛教的转型发展	282
第一节 会昌法难后的佛教	282
一、会昌法难	282



二、禅宗一枝独秀	284
三、丛林建制与佛教中国化的成熟	286
第二节 译业式微与三教合流	289
一、宋代译业：官办译场的尾声与藏经刻造	290
二、儒释道三教合流	295
参考文献	298



第一章

佛教在印度 的创立与世界传播

佛教是佛陀的言教,佛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组织等。它既有印度古老文明发达的信仰体系,深邃的思辨哲学,还有相应的礼仪制度、僧伽组织、宗教伦理和修行方式等等。因此,要了解印度佛典在中国的汉译文化历程,应先了解一下印度佛学思想以及印度文化精神。毕竟,佛教产生于印度,兴盛于中国,中国佛教传自印度,印度佛学、印度文化是中国佛教的文化之源。

第一节 佛教的创立

一、佛教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佛教产生于南亚半岛印度。自古以来,印度就是思想家辈出之地,她不仅仅是世界宗教发祥地之一的国家,还是个民族众多,文化各异的国家。南亚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季风气候,全年高温。炎热的天气使得古印度人好静少动,喜欢静静地思考问题,从而,成为富于思想、以善于内省和沉思而著称的古国。

南亚的文明肇始于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其时,属于印欧语系的



雅利安人的部落，开始从中亚细亚经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以迅猛之势侵入南亚次大陆，印度的历史进入了所谓的吠陀时代。

吠陀(Veda)原意指“知识”、“光明”，所以称为吠陀时代，是由于记述这一时代的历史所根据的文献主要为《吠陀》。

《吠陀》系印度宗教的原始圣典，主要经典有四部：(一)《梨俱吠陀》：祈请者所用；(二)《莎摩吠陀》：歌咏者所用；(三)《夜柔吠陀》：祭供者所用；(四)《阿闳婆吠陀》：祈祷者所用。此四《吠陀》的内容，皆是以祭祀为中心。祭祀制度一直是雅利安文化的中心，雅利安人的整个社会与宗教生活都围绕祭供而运转。他们将大自然予以神格化，崇拜多神，祭礼以宰牲献祭为主要内容，以火、赞歌、食物祭供。祭祀向人们许诺现世的财富和死后进入祖先界与神界。

四经典之《梨俱吠陀》是最古老的原始经典，其编纂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二到九世纪，后三种吠陀成书较晚，所反映的时代为公元前900—前600年或更晚。因而，早期吠陀时代亦即梨俱吠陀时代，这是一个将自然现象神格化的时代。后期吠陀时代为婆罗门教时代(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600年间)，有专职于宗教事业的婆罗门族，从事于《夜柔吠陀》及诸种《梵书》的著作，并将宗教的祭仪做了条理的组织；《奥义书》也在此时发生，对于宇宙的问题，做了哲学的解释。

雅利安人的迁徙史分为二个主要时期。在雅利安人最初迁徙的几个世纪里，雅利安人在旁遮普开始过着以畜牧为主、农业为副的生活。公元前10世纪上半叶，雅利安人通过多年征战，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恒河流域，在该地成立农耕社会。这样，吠陀时代又分为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000年的早期吠陀时代和公元前900年—公元前600年的后期吠陀时代两个阶段，前期社会属原始部落性质，后期是雅利安人的军事民主制向国家过渡时代。在后期吠陀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除了国家，还有等级制度和婆罗门教。

佛教产生于后期吠陀时代。关于这一时期印度的社会性质，学



术界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对其经济上的空前发展,则意见比较一致。由于雅利安人进入恒河流域后由游牧生活转入稳定的农业生活,他们很早就开始使用铁器,经过长期的劳动生活,在生产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交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间以及雅利安人内各部落间争夺财富和土地的战争更加频繁,奴隶的人数逐渐增多。当时除战俘奴隶外,已开始有了债务奴隶,因赌博而出卖为奴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随着社会经济与劳动分工的发展,雅利安人内部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在自由的雅利安人中间形成了三个地位不同的等级。第一个等级是祭司,印度人称之为婆罗门;第二个等级是刹帝利,这是由部落的首领和贵族组成的武士等级;第三个等级是雅利安人的一般成员,印度人称之为吠舍。除了雅利安人中间这三个等级外,还有基本上由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组成的第四个等级,这个等级被称为首陀罗。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为低下,或为独立过活的各类劳动者,或为奴隶。这四个等级在古代印度被称之为“瓦尔那”,汉译佛经译为“种姓”。婆罗门垄断了精神领域,是宗教权威。刹帝利掌握着国家的武力。吠舍是承担农工商牧重任的阶层,这个阶层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商人、高利贷者也在其中。

在文化领域上,由雅利安文化与西北印度的土著文化相结合所形成的新的文化——婆罗门教占据统治思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婆罗教以婆罗门祭师为中心的“四种姓”制度来规范社会,认为四种姓划分是神意,而且是永恒的,人们遵守则得福,反之则获罪。“四种姓”制度成为婆罗门教的一个核心内容。

总体上而言,“四种姓”制度的特点是“两大特征,三个不平等”。两大特征即职业世袭化和种姓内婚制;三个不平等即职业上的不平等,家庭门第的不平等和法律地位的不平等。这三个不平等是天生的,并且靠个人的主观努力永远也无法改变这种不平等。



另一方面，从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前 6 世纪，古代印度各地完成了向国家的过渡，进入所谓“列国”时期，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国家。当时，大的国家有 16 个，相互间征伐不断。当雅利安人扩张到恒河流域时，大量的土著居民加入到了首陀罗的行列，而刹帝利的权势则大增，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割据称雄。

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列国的兼并战争引起了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刹帝利种姓的国王具有很大权势，地位空前提高，王权日益巩固和扩大。

恒河流域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列国兼并战争引起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得到十分敏感的反响。而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婆罗门教对此一时鞭长莫及，恒河流域成为思想真空地带。加上婆罗门教文化同这个地区土著文化的交汇激荡，以及《奥义书》哲学的兴起，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家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形形色色的哲学派别和宗教团体争相成立。他们在哲学问题上自由地各抒己见，各立门庭，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相互辩论，相互批评，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的盛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沙门思潮应运兴起，沙门思潮流派众多，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反对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吠陀》是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的种姓制度。因此，这一时期既是婆罗门正统思想与沙门非正统思潮碰撞激烈时期，也是印度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自由、教派林立、新说盛起的时期，佛教正是在这种印度文化思想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下创立的。

二、沙门思潮

“沙门”的梵文是 sramana，意思是“宗教修行者、修炼者”，其词根是 sram，意思是“努力、精进”。沙门思潮是对非婆罗门教的宗教教派和思想流派的总称，其哲学思想为印度哲学的重要内容。佛教



也属沙门思潮。沙门思潮的思想和组成都比较复杂,观点繁多,耆那教经典中说有三百六十三种见解,佛教则称有九十六种“外道”,六十二种见解。除佛教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六家观点,佛经称之为“六师外道”。他们是:

第一,阿耆多。顺世派的先驱,主张人和世界都由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合成,人死复归四大,四大是独立常存的;否认灵魂和因果报应;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现世享乐。其学说,是对专司祭祀的婆罗门教的反抗。

第二,散惹夷。一种直观主义学派,对一切问题都持相对主义态度,含混而不明确。如对有无来世、有无果报等等,他们认为说有即有,说无即无。所以人们比之为难以捉摸的泥鳅。他们反对婆罗门的世界由梵我转化而来的主张,主张踏实地修定,以求得真正的智慧,对婆罗门承认的业报、轮回之说,采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

第三,末伽梨。自称其说为“正命”(生活),是命定论者。主张没有业报,没有父母生身。一切修行都是空的,无用的。只要经过八百四十万大劫,到时不管智愚,都得解脱,犹如抛丝球一样,缕尽丝完就不滚了。

第四,不兰迦叶。学说与末伽梨相似,也否认善恶业报和婆罗门教。主张纵欲,是伦理的怀疑论者。这一学派创始人的出身是奴隶。

第五,波浮陀。否认人的行为所能发生的影响,认为人身是七种元素构成,七种元素一离开,就是死亡。

第六,尼乾子。后来发展成耆那教,认为生命不得解脱是由于业、漏、缚;因此,就须遮、灭、解脱,以消灭业。他们认为业报太重,要让业报加快结束,就须苦行,故主张苦行。

沙门六师都反对雅利安人注重祭祀的多神论,超自然的力量被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他们有的人用宇宙原理取代自然力量的人格化与世界灵魂说,有的人围绕世界和人生的重大哲学问题和关于



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精神解脱等宗教理论问题进行思考。这是印度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古典吠陀时期的终结和奥义书时代的开端。沙门思潮提出了用苦行的方法取代祭祀成为获得新生活的目标。苦行禁欲虽然早在印度河文明中就已出现，在吠陀中也不鲜见，但它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一种神奇的能力，像吠陀祭祀所允诺的那样，到了奥义书时代这些苦行的目的变了，成为人们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一种途径。关于轮回、业和解脱的观念是沙门各教派的基本教义，后来成为一切印度宗教的基本教义。

三、佛教的基本教法

佛教创始人是悉达多·乔答摩，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悉达多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父亲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国王，称净饭王。七八岁时，太子悉达多师从跋陀罗尼婆罗门，学习《梵书》等六十种书，又从武师学习诸般武艺，学习当时王族应具备的一切学问和技艺。十四岁出城郊游，见了病人、老人、死人、沙门，生起世间无常之感，并启出家修道之念。十六岁时，父亲净饭王忧虑太子出家，为他筑了“寒”、“暑”、“温”三时宫殿，挑选许多宫人美女服侍他，想以五欲牵住太子的出家之心。十九岁时，令他结婚。然而，净饭王虽然用尽一切方法，豪华的宫廷，五欲的迷醉，都不能留住悉达多出家的心。终于，在一天夜里，当大家都在梦乡中的时候，太子起身，看了他那正在酣睡中的妃子及爱子最后一眼之后，悄悄地离开了王宫，自己剃除了须发，披上袈裟，现了沙门相，到深山旷野去追求痛苦的解脱与人生的真理。

悉达多出家后先跟数论先驱阿罗逻和优陀罗学习禅定，又修行了六年苦行，但认为这样做都达不到解脱，便到王舍城外尼连禅河畔伽耶的一棵毕钵罗树下坐禅，经七天七夜，对人生和解脱问题进行思考，大彻大悟，成就佛果，佛教徒们称其为佛陀，意为觉者。